

杜甫入蜀行程北段新考

苏海洋

(天水师范学院 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由于未经实地调查、所用地图为民国旧本和缺少考古资料的证明等原因, 严耕望先生对杜甫入蜀行程北段路线的文献考证有较多商榷之处。运用沿线新发现的北朝晚期至唐代石窟、石刻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资料, 考证乾元二年(759年)杜甫由陇入蜀北段行程的确切路线为: 天水——南河沟——平南镇——张家峡——天水镇——盐官镇——祁家峡——石堡镇——青羊峡——石峡镇——八峰崖石窟——纸坊镇——殿山梁——沙坝——抛沙镇——成县——支旗村——栗川——木莲花掌——小河厂——白水镇——略阳。

关键词: 陇蜀交通; 杜甫; 入蜀行程; 北段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 (2010) 04-0034-05

由秦州治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经成州同谷(今甘肃成县)、兴州政顺(今陕西略阳)的入蜀道路, 是唐代陇右地区通往四川的最重要的通道。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就是循着这条道路入川的。最早系统研究这条交通要道走向的是我国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他在《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秦岭仇池区》中, 以杜甫由陇入蜀行程为切入点, 对这段道路北段走向进行了翔实的文献考察。严耕望先生考证认为, 该道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出发, 沿藉河西行, 经铁堂峡(今甘肃铁炉坡)南入西汉水, 折西经盐井(今甘肃盐关镇)、祁山至长道县(今甘肃礼县东南三十里), 再折南经寒峡(唐长道县南、上禄县北)、成州治所上禄县(建安水入西汉水东南不远处)、今甘肃西和县城、青阳峡(西和县南)、洛谷城(西和县仇池山东侧)、龙门镇(仇池山东南), 折东经汉上禄故城(今甘肃成县西一百二十里)、积草岭(成县西约百里)、浊水戍(在仇池东八十里)、泥公山(成县西约二十里)、同谷、宝井堡(今成县东10里)、栗亭、木皮岭、河池县(徽县西北十五里)至固镇(今徽县)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汇合, 南行经青泥岭、长举县(今陕西白水江镇)至兴州(今陕西略阳)入川。^[1]卷三《秦岭仇池区》, 826-841 由于严耕望先生未经过实地调查, 所用地图为民国旧本, 且没有考古资料佐证, 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 大陆学者李济阻等进行杜甫陇右诗研究时, 关注到其中的方位地名问题, 并结合实地考察, 对

“赤谷”、“铁堂峡”、“龙门镇”、“白沙渡”等与陇蜀交通关系密切的地名的位置提出了新见解^[2], 对研究陇蜀交通确切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受研究资料与研究视野的限制, 一些重要地名的具体方位仍悬而未决, 以致唐代陇蜀大道确切路线问题至今不甚明了。下面, 笔者在吸收学术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沿线发现的北朝晚期至唐代石窟、石刻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 对这条路线的确切走向做出新的考察分析。

—

严耕望先生考证认为, 古道由秦州出发, 沿藉河西行, 经铁堂峡南入西汉水, 折西经盐井、祁山至长道县。李济阻先生根据杜甫陇右诗《赤谷》和《铁堂峡》诗、南宋祝穆《方輿胜览》记载及实地调查, 对这段道路上的赤谷、铁堂峡的位置提出了不同见解, 认为赤谷即藉河支流南河沟, 铁堂峡即今平南镇与天水镇之间的峡谷。^[2]笔者曾运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方法对赤谷和铁堂峡的位置进行反复考察, 认为李济祖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因此,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 杜甫应该沿祁山古道铁堂峡支道而行, 即从今天天水市西南出发, 南溯藉河支流南河沟至皂角镇, 折西南经店镇、云雾山至西汉水上游的平南镇, 再穿越平南镇和天水镇之间的张家峡, 继续顺西汉水而下, 经天

水镇、罗家堡、盐官至长道镇^[3]，而并非严耕望先生所考证的那样，由今天水市向西溯藉河至今天水市秦州区铁炉乡，再向南翻越北秦岭至西汉水流域。

关于寒峡的位置，严耕望先生仅给出了一个“长道县南、上禄县北”的模糊位置。经考察，寒峡应为祁家峡，位于今甘肃礼县长道镇南4公里西汉水支流漾水河下游，峡长近1公里，峡北河谷呈喇叭形向西北敞开，峡南河谷呈葫芦状，西北风从北部喇叭形河谷灌入峡谷，峡南葫芦状河谷排风不畅，致使峡中寒冷异常，故称寒峡。

严耕望先生考证，由寒峡溯西汉水支流漾水河而上至唐成州治所上禄县，上禄县即历城、建安故城所在地，在今西和北或西北二三十里。笔者认为西和北12公里的石堡乡石堡村地势较为开阔，有建立县城的条件，可能为唐成州治所上禄县所在地。石堡乡石堡村法镜寺石窟，为研究陇蜀交通走向提供了重要佐证。法镜寺石窟位于石堡村五台山支脉崖壁上，现存大小窟龕24个，造像11身。石窟以摩崖浅龕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龕窟。特别是中心柱窟，在天水和陇南一带的石窟群中尚属首次发现；大量的摩崖浅龕平面多呈横长方形，圆拱顶或平顶，完全有别于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的摩崖浅龕，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地方特征。研究者结合其窟龕形制、题材组合和造像特征，并与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同时期的窟龕造像相比较，大致推定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在北魏中晚期。唐代乾元年间，杜甫由秦州入同谷途中路过法镜寺石窟，说明其佛事活动至少在唐代时仍很兴盛。研究者根据现存几块清碑的记载，认为明清之际，当地及周边县区的民众，曾数次捐资对法镜寺进行过重新修缮。^[4]

法镜寺石窟中心柱窟为20号窟，窟形平面方形，平顶，高1.70米，宽4.82米，进深3.00米，空窟。从石窟保存的上半部分中心柱看，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窟起源于印度，自新疆向东传播到敦煌后，继续推进到河西走廊及中原北方等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窟型。在传播过程中，前室廊逐渐萎缩，窟顶除有穹隆顶外，还增加了方形、长方形平棊和覆斗型，形制向着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发展。^[5]法镜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与河陇地区最早的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帕提亚、波斯以及印度成分相糅合的“凉州模式”石窟的形制接近。^[6]

那么，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何以传到陇南地区

呢？据《魏书》记载，东晋咸安元年（371年）前秦灭亡仇池国后，杨茂搜孙杨宋奴死，杨宋奴“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7]卷101《氏传》，2228}又据《资治通鉴》卷108《晋纪》记载，太元十八年（393年）“氏帅杨佛嵩叛，奔后秦。”以上文献中记载的“佛奴”、“佛狗”、“佛嵩”的取名说明，至迟在东晋时期，生活在陇南的氏人已笃信了佛教，因此，笔者推测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可能与仇池国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末年至西晋，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中心。五凉至北魏平凉州之前，开始了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译经时代。先是西凉李暠推波助澜，至沮渠氏达到高峰。据《甘肃通志》记载，东晋以后，仇池杨轨曾一度占领镇番县（今甘肃民勤）。^{[8]卷3《建置沿革》}又据《魏书·卢水胡沮渠蒙逊传》记载，仇池氏杨曾与河西走廊的沮渠牧犍交通以叛魏：“太延五年，世祖使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犍虽称藩贡而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北托叛奴，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罪七也。’”^{[7]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2207}可见笃信佛教的仇池杨氏与河西走廊崇信佛法的北凉政权交往甚密，河西佛教影响到仇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北魏平凉州时，除了大批僧人东迁洛阳外，还有一批经陇南流落南方。如《续高僧传》记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收矜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9]可见，由河陇南下川蜀、荆湘，仇池国统治的陇南地区为必经之地。这进一步说明法镜寺中心柱窟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河西走廊佛教的影响有关。

唐宋代时期，在北方中心柱石窟渐次消失的背景下，四川北部出现与地域性文化、道教结合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中心柱石窟，如广元皇泽寺第45号中心塔柱窟、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大足宝顶山第14号中心道场窟和大足南山第5号三清古洞窟等等。^[10]另外陇南法镜寺石窟独具特色的平面方形窟在广元观音崖石窟39号龕、45号龕、121号龕中也有发现。^[11]陇南与川北毗邻，早在考古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形成；陇南中心柱窟与平面方形窟早于川北，所以，川北石窟中心柱窟、平面方形窟的出现不能排除陇南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与陇南紧紧相邻的天水与四川之间的佛教就有交流。唐代，两

地佛教交流频繁。受此影响,天水与四川两地的石窟造像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征。^[12]天水与四川佛教的交流,不能不考虑陇南的中介作用。法镜寺石窟与河陇、四川石窟之间的联系,说明其所在的西和县石堡处于川蜀与河陇地区交通的要道上。

二

严耕望先生考证,古道至今西和县城后,经青阳峡(西和南)、洛谷城(仇池山东侧)、龙门镇至汉上禄县故城。严耕望先生没有考证出青阳峡、洛谷城和龙门镇、上禄县的具体位置,致使其考证的这一段交通路线具体走向不明,甚至错乱不堪。由西和县城南下成县有三条路可走:一路在西和县城南十里铺折向西南,顺洛峪河南至仇池(今甘肃西和县大桥),洛谷城是北魏太平年间在氏杨骆谷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位置应该在西汉水支流洛峪河一带;另一路由西和县城向东南翻越红岭山,进入西汉水支流石峡河谷,经青羊峡(应该就是杜甫当年经过的青阳峡)、石峡镇坛土关南下太石河,或东南经纸坊至成县;第三条在西和县城北东南行,经芦河、草关、上六巷、下六巷至石峡镇与前道汇合至成县。该道上的“上六”,可能就是汉县“上禄”所在地。^[13]

1989年,在石峡镇坛土关村南发现一方唐代石刻,碑名《新路颂并序》,碑文叙述了赵太守开辟新路的经过并颂扬其功德^[14],碑文云:

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代表文字漫漶不清,无法识别,下同),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劳驷骑,弊征轩,□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委□□,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邮堂清闲,朱崖以延敞,牧野以□□,□而傍按。于是,跌□黄□俭,鼓足以蹈之,蠢蠢黎人,以采歌以乐之,恭成颂云,或旌社事。颂曰:我太守兮化融,坐甘棠兮易旧,布仁风兮列郡,苍生叹兮□暮,越水登山兮辟新路,不弊□艰危,人□□劳于转输。冰壶挺操,霜镜凝心。刻石雕文兮□□□□,千秋万岁兮丰扬德音。

从“蠢蠢黎人”看,显系避李世民讳改“黎民”为“黎人”,该石刻应该刻于唐代,但镌刻年代需要重新考察。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天宝元年(742年)改成州(治上禄)为同谷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成州。^[15]卷155《陇右道一》,2905唐代

一直实行州(府)、县制,将州改为郡仅见于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1年)。同谷郡治上禄原名历城,位置大约在石峡镇北37公里的石堡镇。碑文中“郡南”指同谷郡南。由上知之,《新路颂并序》应该刻于唐代天宝年间(741~756年),而不是原报道认为的开元年间(713~741年)。

据考察,今天石峡镇坛土关村山腰栈道遗迹尚存,与杜甫《龙门镇》诗“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符合;坛土关四周群峰攒聚,村口有相公、女豪二山耸立如阙,附近至今有一条公路在“厂”字形山崖下通过,与杜甫诗《龙门镇》“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聚”的描写十分吻合。所以,西和县石峡镇坛土关,应该就是乾元二年(759年)杜甫由秦州至同谷时经过的龙门镇^[2],北朝时期称为龙门戍。

《水经注》记述西汉水与洛谷水(今洛峪)汇合后,继续东南流与洛溪水(今六巷河)汇合。洛溪水“北发洛谷,……西南与龙门水合,(龙门水)出西北龙门谷,……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16]卷20《漾水注》龙门水即六巷河的支流石峡河,洛溪水即六巷河的上源。据《水经注》记述判断,龙门戍位于石峡河与六巷河汇合前上源一带。而当地研究者将其确定在六巷河东侧的西汉水的一条支流小支流甘沟上游的府城集,这是错误的。据《宋书》记载,太元十九年(394年),氏族杨盛“分诸四山氏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17]卷98《氏胡传》龙门戍可能是当时设立的镇戍之一,龙门镇应该是在龙门戍的基础上设置的。

《新路颂并序》云“路泛垫(江),隘吞(巴)蜀……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按垫即垫江,嘉陵江流至四川合川称垫江,因汉代在合川置垫江县而得名。在坛土关东南5公里处,有两条路:一条南经郾家山、木桠里、牛儿坪、瓦窑村、赵家山至大桥乡仇池山;另一条向东南分途抵四川:一支顺六巷河而下,经太石河渡西汉水,再经西汉水支流平乐河、白龙江支流北峪河、武都至文县,顺白龙江河谷而下至四川昭化;另一支东南经成县、徽县至陕西略阳,由略阳折西南顺嘉陵江至广元,或由略阳东南经汉中、米仓道通四川巴中、通江。^[18]因坛土关处于南下巴蜀、西控仇池、北通陇右的要冲,历来为兵家所重。南朝齐建武四年(497年),氏杨灵珍叛魏降齐,遣从弟杨建率五千人屯龙门戍抗魏^[7] 卷66《李崇传》,1644;又如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金将杨沃衍败宋兵于寒山岭、

龙门关、太石渡。^[19]卷103《完颜阿鲁浑传》

由以上论述可知，青阳峡和龙门镇均在石峡河流域；洛谷城在石峡河西侧洛谷水即今西汉水支流饮马成河流域；汉上禄县故城在龙门镇东北的洛溪水上游（今六巷河上游）。由今青阳峡至龙门镇没有必要枉道洛谷城或汉上禄县故城。《新路颂并序》的发现说明，杜甫当年离开法镜寺后，经今西和县城，再向东南翻越红岭山，进入西汉水另一支流石峡河谷，经过青羊峡、石峡镇坛土关南下同谷，并没有经过洛谷城和汉上禄县故城。汉上禄县故城也不在龙门镇东南，而在东北。

严耕望先生继续考证，杜甫离开龙门镇后，经石龕至积草岭（今成县西约百里），石龕即今八峰崖石窟；关于积草岭地望，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从杜甫《积草岭》诗“山分积草岭，路异鸣水县”句看，去鸣水县与同谷的道路在积草岭分异。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鸣水县，东至（兴）州一百三十里，本汉沮县也，后魏宣武帝于此置落业郡，因落业山为名。又置鸣水县，因谷为名，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兴州，皇朝因之。”^[20]卷22《山南道·兴州》按兴州治今陕西略阳。从道理与方位推断，鸣水县位置大约在今天甘肃康县县城或北部的白马关一带。梁晓明先生认为陕西省略阳县北部嘉陵江畔的“明水坝”为唐代鸣水县地名的子遗，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方向与里程皆不符合；高天佑认为“路异鸣水县”即“路径相异处有冰瀑悬挂”，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笔者研究发现，甘肃成县纸坊镇东南的李家坝有两条路：一路向东经草坝、沙坝、严家山、白洼岩、抛沙镇至成县；一路向东南经小川镇、两河口、鐔河、白马关、大南峪、鸣水坝至略阳，至小川镇（浊水戍）后，亦可经鱼窍峡栈道（西狭栈道）至成县（同谷）。李家坝一带的形势与《积草岭》诗“路异鸣水县”十分吻合，因此，李家坝至沙坝之间的殿山梁，可能就是杜诗中所说的“积草岭”。泥功山在今白洼岩崖附近。^[15]杜甫当年应该是沿着李坝——殿山梁——沙坝——严家山——白洼岩——抛沙镇——成县的路线前行的。没有证据表明杜甫经小川镇（浊水戍）、鱼窍峡栈道（西狭栈道）至成县。严耕望先生所论欠妥当。

三

严耕望先生又考证，杜甫至同谷后，东经宝井堡、栗亭、木皮岭、河池、固镇至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南行经青泥驿、长举县至兴州入川。徽

县、成县所在的徽成盆地以嘉陵江的三条支流徽县河、洛河、青泥河流域为中心，由青泥河——洛河分水岭、洛河——徽县河分水岭将其分隔为成县、伏镇——栗川和徽县三个小盆地。三个小盆地被低山、缓丘分隔。由成县盆地至伏镇——栗川盆地，再到徽县盆地，没有像木皮岭一样险峻的大山。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记载成州去河池的路线时没有提到木皮岭。这可能并不是疏忽，而是根本就不需要经过木皮岭。

那么，为什么杜甫在《木皮岭》诗中还说“首路栗亭西，……，南登木皮岭”呢？严耕望先生认为杜甫当年曾因事去两当，后返回固镇，再向南翻越青泥岭入川。学界关于杜甫赴两当路线有秦州赴两当、同谷赴两当和合河口（嘉陵江与永宁河、田家河汇合处）赴两当三种说法。笔者倾向于同谷赴两当说。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云：“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从“寒城”、“阴风”看，诗句描写的是冬天的景象，而非秋天的景象，因此，杜甫曾于乾元二年秋天从秦州赴两当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笔者认为杜甫从两当折回后不是在固镇向南翻越青泥岭至兴州，而是由河池继续向西返回栗亭，由栗亭向南翻越木皮岭，经白沙、水会至兴州入川。据柳宗元《兴州江运记》，栗亭在堡井堡之东；又据杜甫《木皮岭》“首路栗亭西，……南登木皮岭”句，栗亭在木皮岭北坡；又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栗亭镇，在徽县西二十里，以近栗亭故城而名。又西有泥阳镇，接阶州成县界”的记载^[21]卷277《秦州·关隘》，栗亭应该在今徽县栗川镇一带。今徽县栗川镇郇家庄东侧的台地上有栗亭白塔，塔北有清道光十二年（1879年）立石碑，碑文为“修补塔序”。

由栗亭向南，就是木皮岭。《方輿览胜》记载木皮岭在“河池西十里”，同谷“东二十里”。^[22]卷69《凤州》，1213；卷70《同庆府》，1223按河池在今徽县西北银杏一带，同谷即今成县，银杏至成县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33公里，而《方輿览胜》记载两地距离为三十里，明显有误；李济祖先生认为木皮岭即今徽县栗川、大河二乡交界处的木莲花掌^[2]，笔者认为可从此说。

从《木皮岭》“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句看，《木皮岭》诗应该是他第二次到栗亭后所写。又从《木皮岭》“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句之“蜀门”看，木皮岭为秦蜀南入汉中、川蜀的咽喉要道。《新唐书·黄巢传》记载，王铎为都统“置关于沮水、七盘、三溪、木皮岭，以遮秦陇。”^[23]卷225《黄巢传下》，6461《宋史·忠

义曹友闻传》记载，元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万，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24] 卷449《忠义曹右闻传》，13233-13237 又从《木皮岭》“高有旧阁道，摧折如断辕”句看，木皮岭上有栈道通向白沙渡、水会渡。

关于白沙渡与水会渡的位置，严耕望先生认为在今略阳西北一带；李济阻先生认为今徽县南洛河入白水峡处的小河厂，这里是文献记载的南通四川的要冲，而且河沙皆白，与杜甫《白沙渡》诗意符合，水会渡在八渡河入嘉陵江处。^[2]严耕望先生的推断是以杜甫翻越青泥岭至兴州（略阳）为前提的，所以将白沙、水会两个渡口都定在略阳西北的嘉陵江干流沿岸，未必正确。前文已经论述，杜甫并没有翻越青泥岭至兴州（略阳），而是经栗亭翻越木皮岭后沿洛河、嘉陵江至兴州的，因此，白沙与水会两渡，至少其中之一可能在洛河流域。笔者同意李先生白沙渡在今徽县南洛河入白水峡处的小河厂一带的看法。关于水会渡的位置，笔者认为在洛河汇入嘉陵江处更妥帖些。

综上所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由陇入蜀行程北段行程较为可信的路线为：天水（秦州）——南河沟（赤谷）——皂角镇——店镇——云雾山——平南镇——张家峡（铁堂峡）——天水镇——盐官镇（盐井）——长道镇（长道县）——祁家峡（寒峡）——石堡镇（唐上禄县）——青羊峡（青阳峡）——坛土关（龙门镇）——八峰崖石窟（石龕）——纸坊镇——殿山梁（积草岭）——沙坝——严家山——白洼岩（泥功山）——抛沙镇——成县（同谷）——支旗村（宝井堡）——栗川（栗亭）——木莲花掌（木皮岭）——小河厂（白沙渡）——白水镇（水会）——略阳（兴州）。

参考文献：

- [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 1985.

- [2] 李济阻.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J].杜甫研究学刊,2002,(3):44-51.
- [3] 苏海洋.祁山古道北段研究[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4):69-73.
- [4] 孙晓峰.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J].敦煌研究, 2008,(2):3-11.
- [5] 李崇峰.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J].佛学研究,1997,(00):13-30.
- [6]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4-15.
- [7]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8.
- [8] 许容,等,修;李迪,等,纂.甘肃通志[Z].清乾隆元年刻本.
- [9] 道宣.续高僧传[M]//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0] 林从华,张兴国.巴蜀摩崖石刻中心柱窟探源[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3):1-3.
- [11]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观音岩石窟调查记[J].四川文物,2002,(3):3-12.
- [12] 项一峰.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之间的关系[J].敦煌学辑刊,2002,(2):104-108.
- [13] 苏海洋.祁山古道南中段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6-60.
- [14] 何健.西和发现唐代石刻《新路颂》[N].甘肃日报,1989-10-29(2).
- [15]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6] 杨守敬.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697-1698.
- [17]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05.
- [18] 苏海洋.祁山古道南秦岭段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0-52.
- [19]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69-2270.
- [20]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1.
- [21] 穆章阿.嘉庆重修一统志[M]//四部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2] 祝穆.方輿览胜[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4] 脱脱.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艾小刚]

A New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orth Route of Du Fu's Journey From Tianshui to Sichuan Su Haiyang

(Research Centre of Longyou Culture,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China)

Abstract: Mr. Yan Gengwang's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north route of Du Fu's journey from Tianshui to Sichuan, without on-site inspection, using old versions of maps and lacking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leave much to discuss. The paper, employ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based on on-site inspections, finds that in 759 AD, the north route of Du Fu's journey from Tianshui to Sichuan is exactly like this: Tianshui- Nanhegou- Pingnan - Zhanjiaxia- Tianshuizhen - Yanguanzhen - Qijiaxia - Shipuzhen - Qingyangxia - Shixiazhen - Bafengya- Shifangzhen- Dianshanliang- Shaba- Paoshazhen- Chengxian- Zhiqi Village- Lichuan- Mulianhuazhang- Xiaohechang- Baishuizhen- Lueyang.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from Gansu to Sichuan; Du Fu; journey to Sichuan; north route